

會使作者的相關論述失去進一步細緻化和深化的機會。

因此，或正由於此書三部分結構的鬆散而開放，在結論中，作者關於景德鎮民窯業傳統的「復興」和重構沒有很好地和景德鎮厚重的傳統民窯業結合起來，因而，顯得有點空泛而馳騁議論。筆者期盼，《傳統與變遷》一書在未來的修訂版或作者另一本新著中可以看到紮根於「傳統的民窯業」的「民窯業的傳統」在現實中的變遷與重構的生動景象。

黃志繁  
南昌大學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y JUDITH SHAPIR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xvii, 287 pp.**

作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環境與歷史研究」系列的其中之一，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 2001)年的新書《與自然之戰——革命時代中國的政治與環境》(*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分析了1949年後毛澤東「人定勝天」的思想如何統治並影響了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這種思想帶來的後果。從政治運動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時代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為中國環境歷史研究領域開拓了新的視野。

近二十年來，環境主義的問題越來越受到歷史與人類學家的關注，而對於中國的環境問題的關注，似乎偏重於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改革帶來的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上。但是，要理解當代中國的環境污染與破壞，單從經濟改革的角度是遠遠不夠的，夏皮羅認為，必須回溯到對今日中國影響至深的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與環境理念。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不僅對人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同時也是對大自然的嚴重肆虐。作者指出，從1949至1976年，毛澤東放棄了古代中國「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實踐他著名的「人定勝天」的口號，把自然當成人類最大的敵人和征服對象。由此而來的「大煉鋼鐵運動」，「把荒山變良田運動」，「填湖造田運動」，以及「全民學大寨運動」，由於不理會科學家的勸告和忽視地區差別，使中國的自然環境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夏皮羅在概述中講到，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鎮壓、對烏托邦理想的急切追求、教條的形式主義及由國家強制的遷徙移民，大大影響和扭曲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接下來她分別就這四個部分進行了討論。第一是政治鎮壓，這裏包括了知識份子、科學家、官員以及普通人因為對毛澤東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持

不同意見而被鎮壓的遭遇。作者講述了在 1957 的反右鬥爭中，人口學家馬寅初，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因為反對中國無限制的人口增長，以及工程師黃萬里因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壩工程，而同遭壓制的命運。並且指出，中國政府高層因為忽略這樣的警告而導致了日後面對人口膨脹和水土嚴重流失等環境問題。

第二部份是對烏托邦理想的急切追求。因為要在短時間內實現共產主義以及追趕英美等西方國家，1958-1960 年的大躍進運動發動群眾改變中國的地理環境和生產條件，砍伐樹木來大煉鋼鐵，使得中國的林木受到嚴重的毀壞。對自然的肆虐最終引發了人類的災難，帶來林荒和全國範圍的大饑荒。

在第三部分「教條的形式主義」中，夏皮羅以大寨的故事來說明簡單的教條主義對於環境的巨大破壞。饑荒之後，「以糧為綱」成為主導思想，毛澤東號召全國「開荒種糧食」。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功將山地變為糧田的大寨，在 1964 被樹立為全國的典範。在其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政府更號召全國學大寨，改變生產環境大種糧食，但這最後又演變成一場對大自然的破壞行動。全國範圍的「將荒山變良田」和「填湖造田」等運動完全忽略了自然規律和地區差異，植被被大規模地毀壞，造成了日後難以解決的環境問題。

與此相類似的是第四部分所分析的國家強制的遷徙行動。在毛澤東的戰爭觀指導之下，全國開展「三線」建設，大量的工廠搬遷到邊遠地區，將中國腹地大量均衡的生態環境破壞殆盡；「備戰備荒為人民」運動期間，全國各地深挖洞，廣積糧，又破壞了不少地理的均衡；為改造知識青年，向大地要糧，毛澤東又動員大批不懂耕作及農業技術的知識青年到邊疆地區開荒種地，致使雲南、新疆、黑龍江等地方大批的原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總的說來，作者認為毛澤東發起的這場征服自然的戰爭可以概括為兩種互相影響的「虐待」關係：一是濫用人力以及政治鎮壓對人的虐待；二是錯誤的政策及忽視地區差別對地方干預對自然的虐待（頁 15）。而這樣對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破壞，正是現代中國社會產生「信仰危機」和經濟改革後人民為追求物質享受和短期利益而大肆開發自然的內在原因。

從政治鎮壓、對烏托邦理想的急切追求、教條的形式主義及國家強制的遷徙移民這四個核心，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指出了言論自由、民主參與、法制、謹慎小心的政府抉擇、重視地方差異、以及群眾對土地的長久依存關係等問題的重要性（頁 202）。因此，要解決中國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最重要是解決人的問題，亦即民主的問題。她認為就現在的記錄來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哪一種體制可以說對環境有利或有害。關鍵的是與民主有關的一些因素，如學術自由、政治參與、政府的透明運作與地方自治

等等，這都是營造一個健康的自然環境的重要保證。

對於1949-1976年中國的政治運動與環境問題，作者用了很多詳細的訪問材料和中國報紙雜誌上的宣傳材料給我們提供了生動深入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觀點，但是在開頭和結論部分的論述有時卻顯得力不從心。作者一開始比較了中國歷史上道家、儒家、佛教對於環境的看法，認為毛澤東「人定勝天」的思想受到儒家「物為我用」思想的影響，是傳統儒家環境理念發展的一個極端（頁9）；但在同頁的下一段，卻話鋒一轉，認為毛的思想抵制中國傳統及西方觀念【另一篇書評的作者也與筆者有同樣的疑問，見楊大力(Dali L. Yang),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Book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3 (2002):862-863】。作者多次提到毛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關係時均有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之處，她承認毛的思想來源於中國古代的環境理念，但有時又認為兩者完全不同。到底毛的「人定勝天」與古代中國「物為我用」的思想怎麼不同，怎麼聯繫，實有進一步探索的餘地。

另外，作者指出毛征服自然的戰爭是獨一無二的，但又解釋說這種征服行動其實是很多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和古巴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在發展初期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應把它放到一個普遍的模式中來理解（頁201）。那麼毛澤東對自然的戰爭與其他國家征服自然的舉動有何不同？有何關聯？這也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或者說，對於世界範圍的環境問題，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本書的討論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和思考方向。不過，作者的研究還是偏重於國家政策的層面，雖然有對個人的訪問，但對於基層社會如何面對這樣的環境政策以及國家政策在基層社會如何具體運作等，還未有深入的敘述。我認為，這些方面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從讀者的角度來說，理解國家層面的環境政策之後，自然也很想知道中國的基層社會是如何去迎合、接受或者抗拒這些政策的。所以，這方面的個案研究，相信也是當前中國環境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而言之，從環境的角度去觀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自然之戰——革命時代中國的政治與環境》一書將以開創性的姿態在中國歷史研究、環境研究領域成為很重要的著作。所有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或者對中國的環境問題感興趣的人都值得一讀。

歐冬紅  
香港科技大學